

# “行動中”的中國當代女性書寫 ——印度漢學家邵葆麗的性別話語研究

張曉紅\*

**摘要：**印度尼赫魯大學的邵葆麗以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而知名。在《中國女性作家和性別話語（1976-1996）》一書中，邵葆麗把女性書寫視為“行動主義”或者行動中的女性主義，之後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三個層面上剖析其批評功能。邵葆麗的理論框架包含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在橫向維度上，女性書寫和行動主義、文學話語和性別話語、美學經驗和政治經驗，被加以等同，其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傾向於歐美激進女性主義者所弘揚的性別政治和身體詩學；在縱向維度上，邵葆麗準確地把握了性別話語作為一種動態的“社會文化實踐”和混雜的“文化建構物”的特質，對中國性別話語進行適宜的“語境化”處理。儘管帶有歐美激進女性主義話語的偏見，邵葆麗的性別研究仍將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中國當下的性別問題開闢彌足珍貴的“第三條道路”。

**關鍵詞：**邵葆麗 中國女性作家 性別話語 行動主義 身體寫作 第三條道路

## 一、印度漢學界的“一枝紅杏”

二戰後，海外漢學的格局、重心和方法發生巨變，研究重鎮從戰前的老牌歐洲國家轉移到美國，過去以文獻學（或語文學）為主流的研究方法發展成更為豐富和多樣的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方法。同期，海外漢學視域中的文學研究出現了“厚今薄古”的趨勢，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在歐美各國全面開花，美國有葉維廉、夏志清、王德威、李歐梵、奚密等，歐洲漢學大家包括瑞典的馬悅然、英國的杜博妮、德國的顧彬、荷蘭的柯雷和賀麥曉、斯洛伐克的高利克等人。1947年以後，在與中國毗鄰的東方古國印度，漢學翹楚譚雲山和譚中父子引領風騷，積極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使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至20世紀80年代形成相當的規模，湧現

\* 張曉紅，比較文學博士，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副院長。本文為廣東省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資助項目（編號：WYM08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出一大批“學院派”才俊，其中有尼赫魯大學的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邵葆麗（Sabaree Mitra）和墨普德（Priyadaśrī Mukherji）；德里大學的馬杜拉（K. C. Mathur）、莫爾提（Sheela Murthy）和羅易（Shreeparna Roy）；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的恰（Aditi Jha）和杜塔（Kamal Dutta）（尹錫南，2010）。

在男學者一統天下的印度漢學界，邵葆麗可謂一枝紅杏。1997年，她在印度知名漢學家、比較文學學者德什潘教授（G. P. Deshpande）的指導下，完成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現象的博士論文——《毛之後中國的文學與政治》（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Post-Mao China）。她長期致力於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和翻譯工作，置身局外而又諳熟內情，以女性特有的敏銳追蹤風雲變幻的文壇景象和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並把自己的研究焦點定在文化和政治、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文學生產和歷史語境的關係問題上。她的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兩部英文學術著作當中：2005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的文學與政治：問題和主題》（Literary and Politics in 20th Century China: Issues and Themes）和2008年出版的《中國女性作家和性別話語（1976-1996）》（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Gender Discourse 1976-1996）。在主題、材料、方法和體例上，兩書體現了一種承前啓後的歷史連續性，廣泛涉獵中國當下的政策法規、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採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梳理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脈絡，並運用文本分析和“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相結合的方法，透視各種文學話語的形成機制。邵葆麗格外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功能的轉型，發現“中國作家的創作志趣已經從政治宣傳轉移到知識啓蒙、普通大眾的個人愉悅等方面”（Mitra，2004）。

## 二、縱橫交錯的性別話語研究

《中國女性作家和性別話語（1976-1996）》是第一部出自印度漢學家之手的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研究專著。此書篇幅雖短，但信息量大、觀點凝練，主體部分由四個章節構成，第二章對中國當代社會和政治背景作了清楚的交代，第三、四、五章涵蓋了對張潔、張欣欣、王安憶、鐵凝、陳染和林白六位女作家的個案研究。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礎上，邵葆麗大致劃分了當代女性文學史的三個階段或曰三代人：第一階段，以張潔、張欣欣和王安憶為代表的30後、40後、50後作家盡量避免私人化的“小敘事”，把個體女性的境遇置入更為宏大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第二階段，60後作家從私人經驗出發，關注私人化的主題、感情和經驗，而較少探討國家政治之類的“宏大敘事”；第三階段，衛慧和棉棉等70後女作家登場，一反前輩女作家的嚴肅和內斂，玩世不恭地書寫都市青年“漂浮無根”的生存狀態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邵葆麗注意到，在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畫布上，性別話語內部呈現出明顯的斷裂，80、90年代的女性書寫在意旨、內涵、形式和審美情趣上大相徑庭。然而，簡單的“三分法”反映了邵葆麗對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史粗線條的認識。她忽略個體作家創作經驗的複雜性、多變性和交叉性，在彰顯女性書寫政治性的同時，遮蔽了

其文本性和互文性，對於中國當代女性作家共有和獨有的審美經驗和藝術表達的理解流於表面。

《中國女性作家和性別話語（1976-1996）》一書的理論出發點，是把女性書寫視為“行動主義”（activism）或者行動中的女性主義，即“個人的即政治的”女性主義文學實踐。邵葆麗的理論框架包含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前者重當下，後者重歷史。在橫向維度上，女性書寫和行動主義、文學話語和性別話語、美學經驗和政治經驗，被加以等同，其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傾向於歐美激進女性主義者所弘揚的性別政治和身體詩學。例如：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蘇珊·格巴（Gubar, 1986）在《“空白之頁”與女性創造力問題》一文中指出，女性作家的身體寫作是她們反抗父權壓迫的最後一擊，其創作過程融合了身體經驗和社會經驗，並將之轉化為語言，經驗構成女性審美的核心。作為女性寫作（écriture féminine）的主要倡導者和實踐者，法國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想家西蘇（Cixous, 1986）也認為“女性身體是女性書寫的場所”，書寫身體的行為將幫助婦女“解除對其性特徵和女性存在的抑制關係”，歸還“她的能力與資格、她的歡樂、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鎖着的巨大的身體領域”。在兩位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看來，身體詩學具有另類詩學的顛覆性，而身體寫作可以成為反抗父權壓迫和解構“陽具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的利器。

在借鑒西方女性主義思想的同時，邵葆麗（Mitra, 1998）有意無意地迎合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背景下的“文學反映論”和“文學工具論”，放大文學的模仿和再現功能，天真地以為文學這面鏡子真實地反映生活和判斷社會體制的缺陷，忽略了文學經驗和文學表達的重構性和虛構性。如果說文學是一面鏡子，那麼它既反映外部世界、生活經驗和人的心靈世界，又不斷觀照和反映前人的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換而言之，文學具有雙重反映功能，即對外部現實和內部現實的雙重反映。<sup>1</sup>所謂外部現實，即此時此地的現實，是我們所觀看、所聆聽、所感受、所體驗、所思考的日常生活現實、政治現實、經濟現實和社會現實。而寫作者疏離外部現實，遵循或偏離文學成規，運用語言符號和各種形式手段，訴諸想像，從而構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一個自足的世界和時空，一個情感和想像的世界，一種彼時彼地的存在，亦即文學的內部現實。

“文學反映論”和“文學工具論”過分強調文學對外部現實的機械模仿，把文學降格為模仿和反映外部世界的工具，混淆文學外部現實和內部現實的關係，無視文學內部現實的自足性。由於持這樣一種片面的文學觀，邵葆麗基本上採取社會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在女性書寫與行動主義之間劃等號，往往導致“一刀切”的政治化解讀，以及性別標準凌駕於文學標準之上的解讀策略，未能揭示中國當代女性書寫的內容特質、形式特徵和美學價值。

在縱向維度上，邵葆麗準確地把握了性別話語作為一種動態的“社會文化實踐”和混雜的“文化建構物”的特質，對中國性別話語進行適宜的“語境化”處理。女性書寫與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用美國漢學家白露（Barlow, 1991）的話說，“婦女”範疇向來從屬於更為宏大的民族主義議程，在國家話語的籠罩下運作着。邵葆麗（Mitra, 2008）充分借鑒白露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性別話語的歷

史特殊性有着清晰的認識：“關於性別的話語受制於且大抵上被民族主義話語所籠罩，在廣泛發動婦女參加中國進步的民族運動之際初現端倪”。歷時地看，現代中國未曾有過獨立於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成為社會變革和政治革命的一部分，只有通過社會運動的杠杆才能得以實現，難免帶有被動性和派生性。五四運動對纏足、包辦婚姻和納妾制等陋俗進行批判，中國婦女在中國式啓蒙運動中獲得露出水面喘息的機會。一大批所謂都市“新女性”隨之湧現，爲丁玲、蕭紅、白薇和廬隱等女作家的創作提供了生活原型。隨着婦女解放成爲中國國民運動和民族運動的一部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活躍着一大批“中性”的革命女青年和婦女幹部，即邵葆麗所謂的“延安婦女”。新中國成立後，如果參照就業、領導職位和教育等指數來看，婦女似乎獲得了謀求解放的現實基礎和廣闊空間，她們能以半邊天的姿態與男人站在同一平臺上，努力成爲官方所推崇的“鐵姑娘”式模範和榜樣。在20世紀50、60、70年代，中國官方的性別平等話語建立在一種抽象的人性論基礎之上，它強化階級差別，淡化性別特徵和性別差異。這種性別話語立場鮮明，強調“政治正確性”，是一種“自上而下”（top-down）的有組織、有計劃、週期性的話語實踐。

### 三、流變的“身體寫作”

涉及中國性別話語的歷史特殊性問題時，邵葆麗特別重視著名婦女問題研究專家李小江的系列研究，長篇大論地轉述和分析李小江的觀點。兩位學者一致認爲，“平等”概念衍生於西方資本主義權利觀，它抹除男女性別差異，一味強調男性標準作爲女性參照系的合法性，而“解放”才是中國婦女追求的目標，這一目標反過來又讓社會認識和接受兩性性別差異。在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都以追求男女平等爲目標，而激進女性主義（尤其是後現代女性主義）則把男女身體上的差異看作是女性解放和女性獨立的基礎。前者以男性爲標準，強調“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屬於基督教人文傳統下的性別話語。後者則把男性與女性分割開來，宣稱“女人不僅是人，而且是女人”，注重女性與女性、女性與男性因國家、種族、階級、宗教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種差異，呼喚人們注意女性內部千差萬別的經驗。從儒家“和而不同”的性別理想來看，兩者都失之偏頗。中國女性主義在受到西方女性主義影響的同時，多少因襲了中國傳統思維。在中國的接受語境中，西方女性主義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變異，由原來激進的、女性自主的行動演變爲溫和的、有男性參與的、憑借社會政治手段實現婦女解放的包容性話語實踐。這是一種雜糅了儒家倫理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婦女解放觀：既主張從經濟和階級鬥爭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在爭取物質平等的基礎上謀求精神的解放，又強調男女兩性“和而不同”，能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扮演各自合適的社會角色。在中國知識界，嚴肅的女性作家反思和探究自我意識和集體意識、主體性和身體性、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大多出於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倫理的意識形態立場。

中國當代女作家在追求婦女解放的道路上起到排頭兵的作用。謀求解放，首先要從“我”做起，進行自我解放。20世紀70年代末以降，在“文藝復興”的整體氛圍中，女性作家群星燦爛，享有較高的社會聲譽，且利用寫作積極參與到社會各界關於性別的爭論當中，從而推動了具有自發性、草根性、隨意性的非官方性別話語的形成。中國當代女作家的自我定義、自我反思、自我認同和自我定位，既表達她們渴望和追求婦女解放的政治訴求，體現她們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又張揚了個性的旗幟，把被政治化“大我”壓抑的“小我”釋放出來。邵葆麗把中國當代女性書寫理解成一種“行動主義”或曰“社會文化實踐”，並在政治、社會、文化三個層面上剖析其批評功能。中國當代性別話語的建構，一方面受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另一方面又與文學表達的可能性問題息息相關。性別話語所具有的批評功能，在宏觀層面上鏡射中國當代社會文化景觀的萬千變化，在微觀層面上反映女性書寫不同的立場、姿態、方式和形式。

1976年，“四人幫”倒臺，標誌着極“左”政治的結束。個性意識和個體價值重新浮出歷史地表，性別意識也從“革命無性別”的政治幻覺中復蘇。在自由之風的吹拂下，一些女作家急於擺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羈絆，在尋求形式、內容和風格上突破的同時，引入一種性別化視角。在《中國女性作家和性別話語（1976-1996）》一書中，張潔和張欣欣被看成是性別化寫作的“拓荒牛”。邵葆麗認為，兩位女作家都非常擅長塑造自我意識正在覺醒的知性女人形象。在解讀張潔的《方舟》（1982）和張欣欣的《同一地平線》（1981）時，她議論道，“婦女解放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和政治問題，而且包括女性對自身的認可以及整個社會對女性的認可，認可我們自身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Mitra, 2008）。進而指出，儘管一大部分中國婦女已經在30年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但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解放仍然“前路漫漫”，所以張潔和張欣欣的創作“挑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立場，即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權的立場”（Mitra, 2008）。筆者認為，張潔和張欣欣“雙管齊下”，行使着性別話語的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功能，一面用文學手段解除社會和傳統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鎖，一面批判極“左”政治的流毒，解構“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革命女性形象，顛覆了“革命無性別”的政治神話。她們的性別化寫作標誌着“身體詩學”的萌芽。“身體詩學”含有兩層意義：其一，女性身體為寫作者探索特殊的性別經驗及另一種文學，提供了一種可能的途徑；其二，它成為女性寫作者抵制官方意識形態的場所。女性寫作者訴諸女性特有的身體和心理經驗，對固有的傳統社會性別期待進行反思，對“女性身份”、“女性氣質”和“性別平等”等概念進行重新界定，挺身闖入高度政治化社會的“雷區”，力求創造“去政治化”的新型性別話語。儘管如此，張潔和張欣欣基本上採用了符合傳統性別期待和“政治正確”的自我表達方式，她們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無法從心理上完全擺脫對傳統和政治的依附。可以說，她們的反抗和批評並不徹底。

80年代中後期，女性書寫顯現出由外向內的內省氣質，批判的力度反而因此大大增強。王安憶和鐵凝憑藉其新穎大膽的人物刻畫和絲絲入扣的性心理描寫進入邵葆麗

的批評視野中。邵葆麗集中筆墨探討“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1986-1987）和《玫瑰門》（1989）中女主人公所體驗的性誘惑、性慾、感情煎熬和精神痛苦等生理和心理經驗。這些作品呈現女性成熟的自我意識，顛覆傳統的性別權力關係，力求建構女性的主體身份。張浩（2006）指出，王安憶把慾望編織成“三戀”的敘事主線，“坦直深刻地表現了女性慾望，從自然層面、社會層面、道德層面和哲學層面對慾望進行全方位的剖析，從性愛的本體出發，把筆觸直接指向男女間的性愛生活，揭示性的神秘、性的衝動、性的創造與毀滅力，力圖透視傳統的性意識給女性造成的精神壓抑和性悲劇”。根據邵葆麗（Mitra, 2008）的看法，王安憶和鐵凝“表裡不一”，表面上稀釋和緩和兩性之間的敵對情緒，實際上“斷然廢除男權社會的行為模式，摒棄強加在女人身上的性禁忌，聲稱性慾是表達正常人類存在的一種方式”。雖然兩位作家矢口否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她們的性別話語帶有明顯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色彩，記載和反抗男權社會裡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命運。

90年代初、中期，陳染和林白沿着內省的方向走得更遠，幾乎完全退守女性自身的私人空間，“讓性壓抑、性饑渴、性裸露、性變態、自戀嗜好等充斥這一狹窄自閉的女性空間”，從而掀起了一股“私語小說”的潮流（張浩，2006）。陳染和林白的作品筆觸細膩，通過表現私密的主題，借心理分析的手法和荒誕離奇的人物塑造來探索性別化自我的深度和複雜性。邵葆麗（Mitra, 2008）對陳染在《私人生活》、《破開》和《另一隻耳朵的敲擊聲》等作品中塑造的所謂“零女士”（nil woman）形象大加褒揚，稱其“退守”和“非攻”姿態為一種“終極抵抗”，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女性主義立場。在邵葆麗的評價體系中，陳染和林白自我邊緣化，抵制標準化的集體公共話語，最終得以超脫歷史、政治、國家和民族等“宏大敘事”的限制，用“自閉”和“自戀”的方式獲得女性真正的自主。在此，筆者認為邵葆麗混淆了“個人化”和“私人化”這兩個概念，把“私人化”語言曲解為藝術純熟和自主的標誌，片面誇大“私語小說”的思想價值和意識形態意義，把女同性戀文學視作純粹的女性主義文學表達。邵葆麗戴着西方激進女性主義的“有色眼鏡”，不顧中國語境的特殊性而套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進行簡單粗糙的“干預性”閱讀，這樣的做法似乎不足取。

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勢不可擋，中國社會結構隨之產生深刻的變化，過去由“政治掛帥”的單型社會日益轉變為多元、多層和多樣的社會，顯示了“一種集傳統文化（儒家、佛教、道教及封建主義）、西方人道主義、主流中國馬克思主義以及大眾話語和後現代話語於一體的文化雜交現象”（邵葆麗，2007）。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陳染和林白排他性、幽閉症式的“私語小說”發展成極端的、外露的、享樂的、頹廢的“美女寫作”。邵葆麗對衛慧和棉棉的態度模稜兩可，一方面肯定她們擺脫了整部女性文化史上隨處可見的性禁忌，另一方面又不滿於其輕浮的審美風格和平面化的語言。“美女作家”擺出“無可無不可”（nothing matters, anything goes）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姿態，但缺乏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批判性和顛覆性；“她們鍾情於西方‘垮掉一代’的生活方式，卻不肯擔當任何社會責任和使命；她們對日常生活的複雜性避而不談，只關注消費文化和享樂主義時尚生活，以及身體慾望的釋放”

(張曉紅, 2009)。她們“妙筆生花”，把過去嚴肅的性別政治變成現在輕浮的性政治，女人過去作為性被奴役，現在作為性被“解放”和消費。“美女作家”大肆宣揚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性交、吸毒、同性戀和暴力，她們旋轉着舞步，從酒吧到咖啡廳、從舞廳到購物城、從臥室到浴室，脫掉披在隱私上的薄紗，當眾袒露私生活細節。通過文學變形，日常生活感覺好似一個購物城，令人眼花繚亂而又不甚真切，現實幻化為超現實。女性借助媒體的力量，被塑造成或自動變形為有用的消費品。在詩學層面上，“美女寫作”和法國女性主義者所宣導的“女性寫作”和“身體寫作”貌合神離。“美女寫作”自覺地取悅男性目光，把女性身體當做慾望主體和消費對象，主動完成自我異化和商品化的過程。而以西蘇為代表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則強調女性身體是女性文化的基礎，是另類詩學的潛在源泉，身體寫作不僅是身體經驗的表露，而且是通向潛意識領域的路徑，女性可以在那裡叩問被文化歷史語境所遮蔽的女性精神的深邃和複雜性。

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史是一部創作視角不斷變化、寫作姿態不斷轉換、女性空間不斷移位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性別話語的三種批評功能強弱有別而又交叉重疊。20世紀80年代初期，張潔和張欣欣的自我表達可以說是對政治化女性身份的某種反動。王安憶和鐵凝沿承了“去政治化”的寫作立場，對性別歧視和社會偏見提出含蓄而又尖銳的批評，各種社會禁忌和陳舊的性別觀念遭到修正和顛覆。90年代以後，女性書寫的内省氣質更加凸顯，孤獨、自戀、偏執、反社會的女性形象充斥着林白和陳染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末以降，性別政治色彩逐漸演變成商業化的自我展銷，“美女”作家所謂的“身體寫作”披着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外衣，骨子裡與媒體和市場發生了共謀關係，具有較多的消費性和時尚性，傾向於追求市場效應和商業利潤，缺少80年代文本反抗的意識形態意義和文學本身的審美意義，背離了性別政治的綱領。過去的性別政治蛻變成低級庸俗的自我展銷，女性書寫的思想內涵和社會意義幾乎喪失殆盡。當然，在商業行為無孔不入的今日中國，仍然有一批女作家堅守寫作者的精神高地和藝術底線，產出了性別化寫作的精品，如王安憶的《長恨歌》，林白的《玻璃蟲》和陳染的《私人生活》。

#### 四、結語

從全球範圍來看，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轉型期。20世紀80年代的跨文化交流依然帶有明顯的“冷戰”色彩，文化的兩極對立和衝突時有發生。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1年前蘇聯解體，不僅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的裂變，同時也標誌着文化意義上的巨大轉型。原來的兩極格局由多極格局取代，原來的二元對立價值觀轉變為多元價值觀，東西方文化都面臨着重組和重新定位的問題。在文化多樣化和價值多元化的今天，倘若凡事以歐美為參照系，我們勢必會再度落入兩極化的思想陷阱。當歐洲中心意義上的比較文學成為明日黃花之時，以郁龍余（2008）為代表的中國比

較文學學者強烈呼籲確立印度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合法的“第三者”地位，要求合理地使用“第三者原則”。“第三者原則”，與尼赫魯總理在20世紀50年代力主的“第三條道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前者是多元文化時代的一種文化選擇，後者是“冷戰”背景下的一條政治發展道路和國際外交途徑，兩者的共通之處在於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定式和話語模式。同樣地，印度、日本、俄國等“非西方”學術大國無疑能成為海外漢學領域裡有益的“第三者”。印度漢學家邵葆麗從“第三者”的旁觀視角出發，結合中國社會政治現實，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當代女性書寫作為一種“行動主義”或者“社會文化實踐”的動態性質，它雜糅着馬克思主義、西方女性主義、儒釋道傳統、大眾話語和後現代話語等文化元素，而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觀與儒家倫理構成中國當代性別話語的核心內容。其性別研究儘管帶有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的偏見，仍將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中國當下的女性書寫和性別話語開闢彌足珍貴的“第三條道路”。

註釋：

1. 崔衛平(2003)在《積極生活》一書中，區分了兩種現實：“實際的現實”和“作品的現實”。前者指“此時此地”的現實，後者指彼時彼地的現實。她認為，作品的世界給人一種現實世界的印象，好像它是一面鏡子，從中“反映”出現實世界的某些情況，提供有關現實世界的知識。但究其根本，作為“知識”，它是“不確切的”，不過是實際現實的“提示”。

參考文獻：

- (1) 尹錫南，〈20世紀印度的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東南亞南亞研究》，2010(1)，第76-80頁。
- (2) 邵葆麗著，田甜譯，〈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長江學術》，2007(3)，第42-47頁。
- (3) 柳龍余等，《中國印度詩學比較》，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 (4) 張浩，〈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論王安憶創作中的女性空間建構〉。吳義勤主編，《王安憶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第282-291頁。
- (5) 張曉紅，〈“內視”和“外視”中的身體寫作〉，《文學評論》，2009(4)，第116-119頁。
- (6) 崔衛平，《積極生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 (7) Barlow, T. E. (1991).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Chinese wome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Genders*, 10, 132-160.
- (8) Cixous, H. (1986).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E. Marks & I.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An anthology* (pp. 245-263). New York: The Harvester Press.
- (9) Gubar, S. (1986). "The blank page" and the issues of female creativity. In 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pp.292-313). London: Virago Press.
- (10) Mitra, S. (2004). Re-em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 in Post-Mao China. *China Report*, 40, 259-270.
- (11) Mitra, S. (2008).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gender discourse (1976-1996)*. New Delhi: Books Plus.
- (12) Mitra, S. (1998). Comeback of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1976-1989. In C. Tan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pp. 62-72).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Writing “in Action” - On Indian Sinologist Sabaree Mitra’s Study of Gender Discourse**

Jeanne Hong Zhang

### **Abstract:**

Sabaree Mitra from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is a reputed schola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her English monograph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Gender Discourse*, Mitra sees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writing as activism, i.e. feminism in action, which is endowed with the tripartite function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ques. Mitra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Horizontally, she equates women’s writing with activism, literary discourse with gender discours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with political experience, all of which can find a ready echo in mainstream Western feminism; vertically, Mitra contextualizes Chinese gender discourse understood as dynamic socio-cultural practices or as a hybrid cultural construct. Despite its indiscriminate appropriation of western feminist ideas, Mitra’s gender study will pave a meaningful “third path” for us to (re)think gender-related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Key Words:**

Sabaree Mitra, Chinese women writers, gender discourse, activism, writing through the body, third path